

# 论冷战后的中印关系

北京大学国政系教授 陈峰君

东方世界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其友谊源远流长二千多年，为世人所称颂。不幸的是，在30年前两国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给两国的传统友谊和争执后的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似乎难以消除的阴影。然而，当今国际风云变幻异常，东欧剧变，苏联迅速解体，两极格局突然终结，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却为中印两国的关系提供了握手言和与联手如初的天赐良机。两国都在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千载难逢机遇，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而且均把改善两国关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两国总理的互访及其两个联合公报的发表乃是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印两国关系中的阴影正在逐渐烟消云散，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令人喜悦的锦绣前景。这里笔者向世人着力阐述并论证的是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依据。

## —

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冷战后的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共识，为改善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人们不难回忆，被称为中印友谊黄金时期的50年代，两国领导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对于处理各国关系的准则认识是多么一致。两国总理共同倡导并最先在世界上提出的著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印友好的集中体现和象征。60—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使两国关系冷淡，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对苏联及有关问题的看法，相距甚远。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剧变后，两国突然发现，它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几乎又不谋而和，这种共识完全可以和50年代相比。

(一) 中印两国对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的认识一致。关于和平问题，早在1988年12月双方就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反对强权政治所进行的长期坚持不懈斗争的结果。这一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所作的努力。<sup>①</sup>双方在欢迎国际局势缓和趋势的同时，认为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依然面临挑战。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南北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双方指出，没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稳定。中印两国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而努力。<sup>②</sup>

(二) 两国对于当前世界最热门话题——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

则、建立新秩序的基础与原则等问题也所见略同、一拍即合。双方在两个联合公报中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应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共同努力。双方共同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新秩序的基础。在这一基本准则和基础思想的指导下，双方认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应遵守下列具体原则：1. 平等与和平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和解决，各国都拥有制定和执行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主权；国际关系中，应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和平解决，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 发展与合作的原则：应消除日益扩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有利于世界各国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的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问题；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话渠道，促进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应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资金流入不足和技术转让障碍等问题。3. 关于裁军问题，双方一致认为，制止军事竞赛，实现有效裁军。目前的裁军进程应导致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常规裁军也应进一步取得进展。<sup>③</sup>

（三）两国在人权问题认识尤为相近。双方认为，应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件中保护人权的原则，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发展是消除贫困，满足人民最低限度需要的根本前提，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根本的人权。<sup>④</sup>两国之所以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如此接近，乃由于双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以“人权”相压有特殊的共同感受。中国方面受西方“人权”的制裁众所周知，不必多言。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印度同样也是西方人权政治的受害者。

1984年6月发生印度政府用武力镇压锡克教极端分子占领旁遮普邦的“金庙事件”。不久，西方舆论纷纷猛烈抨击英·甘地政府的行动。1989年2月，中国动乱前夕，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由议长、共和党议员和7名法律工作者联合提出），要求印度政府不得使用警察和准军事部队采取所谓“侵犯人权的行动”；要求释放被监禁的锡克教恐怖主义分子；让国际人权组织到旁遮普邦进行调查，否则将不给予印度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等。此外，美国还把印度列入美国贸易法案301条款，限制其对美国的出口国家之一。以后美国又不断以人权相威胁，干预印度内部事务。印度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借人权为名干涉内政的恶劣行径极为不满。它拒绝就此与美国举行谈判。基于印度在人权问题上的遭遇与特殊感受，它对于中国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西藏少数人的暴乱采取了令人赞赏的明智态度。它没有响应西方借人权之名对华的攻击和制裁。印度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甚至连这方面的消息也没有播放。中国平暴后，西方一再拉拢印度，宣称要把投资和援助更多地从中国转向印度。援助财团决定于1989年度援印67亿美元。英国一家报刊煽动说：“中国的动乱给印度带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天赐良机”，印度应趁此黄金时机“把中国作为全球生产链条中一个低成本制造中心的角色接过来，”并说“有关外国投资的规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sup>⑤</sup>然而，印度政府不仅未能对西方的引诱所动，反而坚持对华友好，实在难能可贵。此后，印度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一直持采取与中国相近似的立场。1991年在哈雷英联邦会议和在加拉加斯举行的15国集团会议上，印度一再谴责西方关于人权的概念。拉奥总理说：“西方关于人权的观念有很大局限性，印度难以接受，印度也不能接受西方主张的将人权问题作为提供财政经贸援助的条件”。<sup>⑥</sup>可以说，印中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患难与共，故而是患难之交，旧情未忘又增加新谊，这不能不对一度失和的邻居和老朋友重归于好产生重大影响。

## 二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印友好关系必将造福于两国人民也将造福于亚洲与世界。中印两国均把改善两国关系看作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也以同样的观点看待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中印两国确立合作关系无疑对国际政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sup>④</sup>

从地区稳定的意义上说，印中友好有利于亚洲各个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局势的稳定与发展，印中两国人口总和20亿，占亚洲人口总和的2/3，地域约占亚洲1/3（除去苏联部分约占1/2以上），经济产值的总和仅次于日本，军事上是亚洲的第一、第二大国。两国联手和睦相处，对亚洲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不能不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在两个范围内发挥：第一：中印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消除及两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本身就是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一个贡献。因为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各自国内一切重大问题几乎都牵动和影响整个地区。而且中印两国在亚洲所有地区一切重大问题上几乎都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与印度在东北亚、东南亚、西亚、中东均有直接与间接的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与往来。战后50年代中印两国对亚非会议的召开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制定，对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东战争等均发挥过积极作用和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印两国在亚洲一系列问题上如海湾战争、阿富汗问题、印支柬埔寨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也已发挥并正在发挥重要积极影响。第二，中印两国关系的好坏对日本的影响极大。日本是亚洲的头号经济强国，日本在亚洲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集中于亚洲。据统计，1988年日本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共64亿美元，其中亚洲占60%，拉美、非洲、中东及其他地区各占10%。同年日本10大受援国中，9个国家在亚洲。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直接投资从1951至1988年度累计达718亿美元，其中亚洲占44.9%，其次才是拉美与非洲和中东。<sup>⑤</sup>可以预料，中印友好必将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中印两国拥有广阔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日本可以在这里纵横驰骋，并可通过两国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日本的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这点。日本《每日新闻》在中印首脑会晤的时刻立即发表题为《中印关系增加了重要性》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印两国总理首脑会议“对国际政治和日本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报认为，日本在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还应重视与印度的关系，过去“轻视印度的重要性”，现在是重新认识南亚的时候了。”<sup>⑥</sup>中印友好不仅可以促进日印中三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且也能制约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从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世界舆论认为，亚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历史上一是“北极熊俄国，一是“东亚虎”日本。现在“北极熊”已坠倒在地，一时难以构成亚洲的威胁，人们倒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倘若中印两大国联手，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无疑难以得手。反之，倘若中印两国关系恶化，必将大大削弱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的外在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世界范围上讲，中印友好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中印是世界人口第一、二大国，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和的2/5，面积是世界第四和第七大国，军事上是第三和第四大国。中印两国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的作用非同一般。日本《21世纪》杂志曾评论说，“90年代是七极世界，即世界将由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布鲁塞尔、北京、开罗和新德里七极构成”。它还

说，“七极是历史形成的几种文明。16世纪初，在欧洲发展之前，世界曾以东欧、伊斯兰、中国和印度四极为中心；西欧与东欧、伊斯兰相联系，日本则与中国、印度有关。”<sup>⑩</sup>这种看法虽然并不普遍，但已逐渐为人们可接受。美国基辛格博士和前苏联国家顾问沙赫纳扎罗夫共同认为，世界未来多极化结构将由美、欧、俄、日、中、印等拥有对等实力的国家构成。<sup>⑪</sup>既然中印是当今和未来世界多层次多极化中的“两极”、它们的联合其力量和影响就自然不同凡响。

其一，印中合作将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富国愈来愈富，贫穷的国家愈来愈贫穷。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它们继续面临着债务负担过大，资金倒流严重和贸易条件恶化等困难。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最终导致新的动荡，乃至成为引起新的地球性冲突的根源。两位第三世界巨人联合起来，在经济领域里彼此合作、协调发展，必将增加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必将增强南北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力量，从而必将能够加强南方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和份量。同时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也必将为其发展中国的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李鹏总理访印前后，印度各大报发表文章纷纷指出，如果中印两国把自己的潜力联合起来，可以对南南合作作出很大贡献。

其二，中印联合有助于共同抗衡新的国际寡头的强权政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苏联东欧剧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困难，西方国家在全球格局中居于有利地位。它们极力以美日欧三极体制或七国首脑会议来确定世界新秩序。美国甚至要以唯一超级大国身份来确立以它为核心的单极体制。印中两国，从单个国力上讲，难以与美、德、日等国匹敌。在世界格局中很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当前的严峻形势要求占世界人口40%的中印两大国，从世界大局出发，从长远眼光着眼，求同存异，紧密联合，在国际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这不能不严重冲击着并且已经冲击了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对此，许多国家纷纷发表评论。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评论说：“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苏联崩溃之后自我观念深受震动，决心消除冷战时期的敌对，恢复印中和解，在亚洲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通过合作以求达到所谋求的大国地位的想法，看起来是诱人的。”<sup>⑫</sup>这里所说的“建立新的权力中心”和“谋求大国的地位”之说自然是西方的说法，我们并不赞赏。用我们的话应该是建立或谋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打破少数国际寡头的强权政治。法国《世界报》也评论说，“两个亚洲大国决心要将过去的一页翻过”，“一致对美国乃至西方霸权主义保持警惕”，谴责他们“在苏联帝国垮台的时候”“操纵世界事务”。<sup>⑬</sup>印度报纸的评论说，由于新的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两国面临相同的问题。现在两国乘坐在了同一条船上，他们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这“将会引起全世界的兴趣”，“对建立以国家平等和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将发挥重要作用。”<sup>⑭</sup>可以预料，中印联手抗衡西方的强权政治的影响，必将在90年代以至21世纪发挥愈来愈大的威力，对此是不能低估的。

### 三

中印两国改善关系更为直接或主要原因是基于各自国家在新的国际局势下的战略考虑。

就印度而言，随着苏联的解体，印度战略地位发生了明显不利于它的深刻变化。其一，印度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已不复存在。前苏联是印度的最大军事武器供应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是印度最要好的盟友。印苏关系的转折不能不对印度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印度

报纸评论说：“从战略上看，冷战的结束使印度丢了分”“作为苏联的朋友，现在再也不象冷战时期那么重要了。大约两年前，印度还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好朋友而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占一席之地。”<sup>⑤</sup>在以往几十年中一贯善于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坐收渔利的印度，突然感到自己的战略地位下降。印度外交评论家迪·穆克吉评述说：由于东西方争夺的消失，“印度在世界上纵横捭阖的余地减少了。这使它比以往几十年更容易受到伤害。”<sup>⑥</sup>其二，苏联的解体和国际局势的缓和，使印度在亚洲和南亚次大陆早年形成的1:2战略对抗格局（印苏同盟对抗美巴同盟与中巴“同盟”）发生了重大变化。印苏接近的基础之一（中苏对抗）已告结束，中苏（俄）关系已实现了正常化。苏用印来牵制中国的战略考虑已不复存在。印苏关系的第二个基础（美苏在南亚的争夺）也因苏联解体而中止。随着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原来的印苏对抗美巴格局已不再起作用。其三，苏解体后，由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特别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前苏联的中亚六国和西亚国家加上巴基斯坦，大有联成一体的趋势。中亚六国均是内陆国家，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利用巴基斯坦的出海口，同全世界沟通，强烈渴望巴基斯坦和西亚各国给予他们在经济建设与改革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印度尽管努力保持同中亚与西亚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但其程度无论如何不如巴基斯坦与它们的关系，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形势，不能不迫使印度向东靠拢，重新寻找盟友和重新组合对外关系，否则必将陷入孤立境地。其四，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印度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其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和地域优势越来越失去重要性。而且印度国内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经济上，印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外汇危机，欠西方外债已高达720多亿美元。拉奥执政后的经济改革步骤迫切需要印度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有效支持。政治上因民族、宗教的严重纠纷和近几年内各政党力量的争斗，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加上西方国家在印度民族问题上利用“人权”大棒对它横加指责，从而使印度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总之，印度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感到格外孤独。美国报刊评论说，印度“感到在苏联和东欧紧变中茫然不知所措，而且处于孤立的困境”。<sup>⑦</sup>

印度的这种孤独困境迫使它重新调整已过时的亲苏的外交政策。这种调整实际上早在拉·甘地执政时期就已开始，不过在拉奥执政后更加明朗。拉奥刚刚上台便声言，要在冷战后的世界新形势中实施“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调整与几个大国的关系。这当中自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政府把改善对华关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目的，根据各种材料分析，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中国修好不仅可以提高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其“维护不结盟盟主地位的手段”，<sup>⑧</sup>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有迹象表明，印度渴望能与中国一样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如果能够得到中国的鼎力相助，这种愿望并非没有可能，外报评论说，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欲望也只有得到中国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在这方面印度无疑有求于中国。

第二，可以利用中国牵制美国。印度认为，美国今后仍将加紧拉拢它，但难以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印美关系仍将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起伏不定。印中友好无疑增加对美关系的筹码，印既可以与美保持友好关系，又不致于在美面前低三下四，可以抵制来自美国的种种压力。

第三，防止南亚邻国依重中国，共同抗衡印度，特别是可以减轻中巴“合谋”对付印度。印巴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旧仇未消又不断增加新恨，尤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巴双

方剑拔弩张。印方如能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情，那怕是它认为的中立立场，那对它将是极为有利的事情，可以改变过去“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四，与中国友好、保持中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既可以避免中苏边界解决后，中国将挥师西南，加强对印的压力，又可以大大减少和北部边关守卫人员，减少军费开支。据统计，印度军费已从1987年的96亿美元降为1991—1992年度的71亿美元（按卢比贬值后的比值计），由原来占预算总开支比重的20%降至14%。

第五，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同中国的贸易。1983—1984年度中印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8.1亿卢比。1989—1990年度则为58亿卢比（约2.64亿美元），即增长6倍多。实际上，印中经济合作潜力是很大的。印度专家认为，印度的镓矿、铁矿、塑料、铁路车厢、摩托车、水泵、铁锭和钢锭、皮制品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出口，同时希望从中国进口煤、石油、铝、氮肥、新闻纸、化学制品、药品、铜、锌、食物用品等等。预算90年代中期印中贸易额可达10亿美元，大约是80年代上半期中印贸易额的30倍。倘若印中进一步好转，印中贸易还将增大。这无疑会加速印度的经济发展。

就中国而言，东欧苏联剧变的冲击波从表面看来似乎要甚于印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某些外国观察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孤独感”和“危机感”。我们清醒地看到，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冲击既是挑战同时更多地是机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联解体后亚洲地区出现了比过去安定得多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极有利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与解体后苏联政局的动荡、经济恶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国内政局稳定，经济蓬勃向上发展，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事实。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中国稳稳坐在亚洲东方这艘巨大的轮船上，在风云剧变的大海上正在乘风破浪向前不停地行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友好。毋庸置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一样正在根据新的局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立足亚太，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与印度友好并改善关系，既是我国的国策，同时也是我国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印度友好关系对中国本身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一，印度是我国南部山水相依的最大邻邦，在近现代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印度人民给了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50年代两国尤为情长谊深。即使在60年代中印关系破裂之时，印度也一直主持正义，坚决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期间，印度采取十分谨慎明智与友好态度，并在人权问题与中国共抗西方强权政治。这样的邻邦与朋友，我们决不能轻而易举地抛弃，而且要格外珍视与它的友谊。借用前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早在1959年曾说过的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如此”，“两国间的争吵，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的一个插曲而已，值得大惊小怪”。“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sup>④</sup>

第二，有利于打破西方大国孤立中国的企图。众所周知，当前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倾向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国家中有些人竭力推行反对和孤立中国的极端主义的主张，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并推行强权外交，实行所谓制裁，并寄望于中国步苏联后尘出现惊人的变动。与印度联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在反对大国强权政治上，用一个声音讲话，不仅

对于改变世界旧秩序、冲破大国的强权与垄断，而且可以使其孤立中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而能够进一步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

第三，有助于保障我国边界的安全和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长期以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北部为据点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从事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对我国西藏和西南边境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则无疑有利于约束藏独分子和印度国内少数的反华势力的阴谋活动。西藏稳定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将会更加稳定，台独势力也必将更加孤立。

第四，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印改善关系即可以保持中印2千多公里边境的安全，又可以节省相当一笔军费开支或用于经济建设，或用于提高军事装备素质，而且也可以发展与扩大同印度的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关系。中印双方贸易近几年虽有扩大但也只有2亿多美元。实际上，中印经济合作的领域很宽，潜力不容低估。我国可以在石油、煤碳、食用油等产品向印度大量出口，并扩大其他领域的市场。印度国内能源缺乏，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和煤碳。食物油是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传统项目。印度对其需求有增无减。因此，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潜力仍然很大。此外，中印边界稳定后随之而来的必将是中印双方边境贸易的兴旺。这无疑有助于西藏地区的经济开发。此外，中国还可以更好地学习与借鉴印度在经济建设与改革方面的经验。

#### 四

90年代新形势下的中印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友谊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仍尚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敏感性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倘若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甚至出现曲折和倒退。

（一）边界问题是中印之间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两国一致认为，边境问题与分歧不应成为改善与发展关系的障碍。1988年中印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会谈达成的共识，为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它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sup>①</sup>1991年两国总理会谈和商定的一些具体计划和措施，为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进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例如，为了让边界联合工作小组发挥更大的作用，1992年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工作组会议将讨论保持边界地区与安宁的具体措施。双方边防人员过去的不定期会晤将改为定期会晤等。<sup>②</sup>尽管这些措施算不上解决边界问题的重大行动，但却可以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有助于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进程。

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比较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自然非一日之功。它涉及东西中三段边界大约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端。但是，只要本着“求同存异”和“互谅互让”的指导原则，是可以最终得到解决的。所谓“互谅互让”是指在解决问题时，既要尊重历史，也要尊重事实，又要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双方互相谅解，任何一种谈判若想获得成功，双方都应该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最重要的是一要有诚意，二要有耐心。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抱着诚意和耐心，中印边界终将成为连结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纽带。

（二）西藏问题。中国一贯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制造“西藏独立”的企图和行为。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除了“西藏独立”外，其他问题都可以谈判。印方也一再申明，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

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方在行动上也一直恪守诺言。对于拉萨骚乱也持谨慎态度，一再要达赖不要在印度搞妨碍印中关系的事情，力阻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到我驻印使馆前闹事。印度警方多次逮捕闹事的示威者。中国对印度的这种立场和态度表示赞赏。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达赖问题和印度的近10万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并非易事。达赖及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活动依然频繁而猖獗，达赖本人到处游说，明显暗里进行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在印度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存在。印度少数反华势力，对“藏独”和达赖的立场持同情支持态度。李鹏总理访印前夕，印度反对党一些议员召开所谓“喜马拉雅安全和西藏和平会议”攻击中国，并非议印度政府对华政策，他们甚至声称，“在西藏获得自由之前，印度独立就不彻底”“只要西藏还是中国的殖民地、印度就不会安全。”<sup>②</sup>尤为值得注意是，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竭力支持达赖的活动，给予大量援助，把它作为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一切都不应妨碍中印关系的改善。只要印方继续持中印两个联合公报中的立场，中印关系不仅不会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影响，反而有助于西藏的达赖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 关于印巴关系问题。中印联合公报明确宣布：“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sup>③</sup>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南亚所有国家都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至于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争议问题，我们希望两国能够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妥善解决，而不诉诸武力，两国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克什米尔问题，两家因此而长期争议不休，而且几次兵戎相见。众所周知，中国对克什米尔的立场是促进印巴双方协商解决。印度对中国这种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与主张表示赞赏。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共识，无疑有助印巴之间关系的缓和，也有助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印巴两国另一敏感问题是关于核武器的问题。中国政府一向支持世界各国建立无核区的主张。我们对于巴基斯坦关于在南亚建立无核区的建议，采取支持态度。印度目前对巴的倡议持有保留和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相信这一问题不会也不应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在中印巴三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问题将会取得一致看法的。

## 注 释：

① 《中印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4日。

②③④ 《中印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7日。

⑤ (英)《金融时报》1989年6月23日。

⑥ 新华社新德里，1991年12月13日。

⑦ (日)《每日新闻》社论：《中印关系增加了重要意义》，1991年12月17日。

⑧ 陈庄：《日本对发展中国的资本输出一现状问题与前景》，《美日欧和三世界》，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⑨ (日)《每日新闻》，1991年12月17日。

⑩ (日)《21世纪》，1990年1月。

⑪ (日)《读卖新闻》，1992年1月4日。

⑫ 《印中首脑会晤：以亚洲大国作为目标》，《法兰克福评论报》，1991年12月16日。

⑬ 《中国和印度希望翻过历史的一页》，《世界报》，1991年12月17日。

⑭⑮ 《印度斯坦时报》，1991年12月30日；12月14日。

⑯⑰ 《印度时报》，1991年11月24日；1992年1月3日。

⑱ 《纽约时报》，1991年12月12日。

⑲ 《每日新闻》，1991年12月17日。

⑳ 潘自力大使对印度外交部秘书杜德的书面谈话，1959年5月10日。

㉑ 《中印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4日。

㉒⑳ 《中印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7日。